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docsriver.com
商家本本店

十九世纪历史学与 历史学家

上册

〔英〕乔治·皮博迪·古奇 著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十九世纪历史学与 历史学家

下 册

〔英〕乔治·皮博迪·古奇 著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十九世纪历史学与 历史学家

上册

〔英〕乔治·皮博迪·古奇 著

耿淡如 译

卢继祖 高健 校

谭英华 校注



商务印书馆

1989年·北京

B657887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www.docsriver.com 商家 本本书店
内容不排斥 转载、转发、转卖 行为
但请勿去除文件宣传广告页面

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十九世纪历史学与 历史学家

下 册

〔英〕乔治·皮博迪·古奇 著

耿淡如 译

卢继祖 高 健 校

谭英华 校注



北京大學圖書館

1989年·北京

B 657870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

(全两册)

[英] 乔治·皮博迪·古奇 著

耿淡如 译

卢继祖 高健 校

谭英华 校注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0062-9/K·11

1989年10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89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字数 618 千

印数 2,500 册

印张 29 插页 8

定价: 12.65 元

HISTORY AND HISTORIAN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By G.P.Gooch

First Published in 1913 by Longmans, Green and Company

First published as a Beacon Paperback in 1959 by
arrangement with Longmans, Green and Company

根据美国波士顿灯塔出版社 1959 年平装本译出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出版说明

我馆历来重视移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从五十年代起，更致力于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的古典学术著作，同时适当介绍当代具有定评的各派代表作品。幸赖著译界鼎力襄助，三十年来印行不下三百余种。我们确信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够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些书籍所蕴藏的思想财富和学术价值，为学人所熟知，毋庸赘述。这些译本过去以单行本印行，难见系统，汇编为丛书，才能相得益彰，蔚为大观，既便于研读查考，又利于文化积累。为此，我们从1981年至1986年先后分四辑印行了名著二百种。今后在积累单本著作的基础上将陆续以名著版印行。由于采用原纸型，译文未能重新校订，体例也不完全统一，凡是原来译本可用的序跋，都一仍其旧，个别序跋予以订正或删除。读书界完全懂得要用正确的分析态度去研读这些著作，汲取其对我有用的精华，剔除其不合时宜的糟粕，这一点也无需我们多说。希望海内外读书界、著译界给我们批评、建议，帮助我们在这套丛书出好。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1987年2月

中译本序言

I

英国著名史学家古奇 (George Peabody Gooch, 1873—1968 年) 所著《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一书, 是在西方世界享有盛誉, 历久不衰的学术名著。早在 1910 年, 古奇为《剑桥近代史》第十二卷即末卷撰写了题为《历史科学的发展》一章(第二十六章)。尔后, 在此基础上, 续事增修, 撰成此书。这部著作于 1913 年初版问世后, 立即博得了欧美史学界的好评。美国史学家肖特韦尔 (J. T. Shotwell) 誉为“前所未有的鸿篇巨制”, “是对史学也是对文学的贡献”。^① 欧洲史学名家如德国的迈尔 (E. Meyer), 英国的屈维廉 (G. M. Trevelyan) 对作者的渊博知识和所掌握的丰富文献深为折服, 给以很高的评价。^② 古奇亦由此而声誉鹊起, 跻身世界第一流史学家的行列。50 年代, 作者对本书作了几次全面的补充、修订。新版仍然备受欢迎, 有人称之为是“对历史学作出的不朽贡献”。^③ 七十多年来, 这部著作不断重印, 并被译为西方多种文

^① 《美国历史评论》, 1913 年 10 月号, 书评。

^② 关于西方史学界对此书的重要评论, 参见 F. Eyck: 《G. P. Gooch, History and Historians》(MacMillan, 1982) 第 219—223 页。

^③ Fred. L. Hadsel: 《George Peabody Gooch (1873—1968)》, 载 S. W. Halperin 主编: 《Essays in Modern European Historiography》(The Univ. of Chicago Press, 1970) 第 74 页。

字和日文,成了研究近代西方史学必不可少的基本读物。

《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不是一本为初学所编写的教科书,也非通俗读物,而是融会了作者对近代西方史学的心得体会,真知灼见的学术著作。全书涉及五百多位史学家,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头绪纷繁,范围辽阔。在编纂上,既非严格按照时代顺序,亦非完全依国别、地区进行分类,体裁多样,不拘一格。在叙事上,作者往往根据自己的见解来剪裁取舍,纵横驰骋,夹叙夹议,直抒胸臆,为一家之言。对一些史学上的重大事件,史学家的生平,有的略而不书,有的不具始末,使人难以一目了然,体会要领。为了方便阅读,现在先对此书主要内容作一简要介绍,然后进行评价。

全书初版二十七章,1952—1958年增加了介绍近数十年史学新成就的《导论:近时的历史研究》一章,共二十八章,除第一章《从文艺复兴到法国革命的史学》外,其余二十六章采取分国叙述与专题介绍相结合的方式,第二十一至二十七章全属专题范围,而分国之中亦有专题介绍。在二十六章之中,德国占七章半(第二至八章,第二十四章第一节),英国六章,法国五章,德国史学所占篇幅为全书四分之一强,居于首位。

德国部分是以兰克学派为中心,上下推溯,左右延衍来开展记述的。第二至五章从近代批判史学的先驱尼布尔和在浪漫主义思潮影响下,为拿破仑战争所激发的德意志民族文化、民族历史研究的发展两个互相联系的方面,介绍了兰克史学的背景。作者认为尼布尔以其对早期罗马史料的考订和对罗马制度、阶级与风俗之起源的研究,“把处于从属地位的史学提高到一门庄严的独立科学”(第二章);尼布尔并且是最先重视历史研究与爱国主义教育之

联系的学者之一。浪漫主义史学最缺乏的是历史考证方法，批判史学恰恰弥补了这一缺陷。沃尔夫把语言学的方法应用于古史研究，提出史料必须通过内容和外形的验证的原则。博克搜集希腊铭文，用古代语言来考察希腊文明，为历史研究开辟了一个新方向。奥·缪勒第一次用神话学来恢复早期希腊罗马历史。格林的童话研究创立了关于条顿族起源的科学，他的语言研究则创立了历史语言研究法，以上几人都有力地促进了德国的历史研究。对德国史学一度发生过影响的法理学的历史学派，把民族生活和国家历史，法律的兴革和民族生活联系起来，强调了历史的延续性和继承性。萌芽于反拿破仑斗争时期的《德意志史料集成》这一首创的巨型史料丛刊，不仅推动了民族主义史学的发展，而且为以批判精神与考订方法整理史料树立了典范。

兰克第一次将尼布尔的原则用于研究近代历史，并在其《拉丁和条顿民族史》中提出了后来成为“客观”、批判史学旗帜的口号——“说明事情的真实情况”。他的代表作《教皇史》，把教皇制度当作一种历史现象来考察，肯定它在中世纪作为欧洲文明的伟大统一因素的作用。此书以其态度“公正”，和批判地处理史料，赢得好评，并为这一学派史学树立了基础。古奇总结兰克在史学上的成就为：他尽最大可能地把研究过去同当代的感情区别开来，描写事情的实际情况；建立了论述历史必须严格依据同时代资料的原则；通过对权威性资料之分析、鉴别、订正，开创了考证的科学；阐明了欧洲的统一性，描绘了历史戏剧中的主要角色，使近代欧洲历史更加为人了解。对于兰克史学的缺失，也提出了评议，但认为那些缺失是消极的而非积极的。

兰克之所以蔚为一代宗师,除了他在学术上的吸引力外,还得力于长期举行学术讨论班,使其影响世代相传,并不断扩大;同时,他的学术地位也是经受了与他对立的学派和学者的抨击而成长起来的。第七章介绍了兰克的论敌利奥、罗特克、施洛塞尔与格维纳。在门人中介绍了恪遵师教继承衣钵的魏茨、吉泽布雷希特等人。

一反兰克学派的最高信条,公然声言要以史学为霍亨索伦王朝效劳的是“普鲁士学派”。达尔曼被称为这一学派的“精神之父”,而实际上使这个学派扬名世界,并影响了普鲁士政策的是德罗伊曾。背离了兰克学派的聚贝尔是这一学派的另一名主将。古奇称他是“使他们的同胞作好准备,迎接那完成于1870年的大转变起了很大作用”(第八章)的学派的领导人。这个学派的殿军特赖齐克的名字“代表了德国由邦联的瘫痪状态上升到1870年的光荣地位的过程”(第八章)。古奇对他们为政治目的而抛弃“客观、公正”原则的政治态度与方法进行了冷隽而严肃的批评。

以《蒙森和罗马史研究》为题的第二十四章高度赞扬了蒙森的史学成就,认为他对古意大利方言的研究是对历史学、人种学,以及前罗马时代意大利语言的划时代贡献。他的《罗马史》为近代世界提供了第一部关于罗马共和国的全面概述。蒙森不仅由于记述历史,而且由于解释制度,编纂铭刻和文献博得了声誉,与兰克并列于19世纪第一流史学家。

关于法国史学的介绍,采用了划分学派和专题两种方式。以1789年大革命为起点,按时间顺序,首述“浪漫主义学派”。列举了夏多勃里昂、梯叶里、米什莱等五人。认为夏多勃里昂的《基督

教真髓》对于解放思想,扩大历史想象力,激发历史感起了重大作用。梯叶里的《诺曼人征服英国史》开创了一种新的、有力的编纂方法,是法国第一部高度文艺性的历史,但不同意其论点。说来什莱的著作把庄严雄壮、诗情画意同对人民的热爱结合起来,取得了艺术和历史的统一。他的书中只有一个主角,那就是人民;但由于心情太激动,感情太强烈,他对生活的看法不稳定,不全面,缺少精确性。第十章记述以基佐为首,包括米涅、梯也尔的“政治学派”。他们是以历史为武器,反对复辟王朝的战士,他们研究和编纂历史的目的是解释而非叙述,是教导而非描绘。他们既反对绝对专制,肯定大革命的必然性,又反对雅各宾主义,谴责恐怖政治及其引起的后果。

以下三章是有关法国中世纪和旧制度,大革命,拿破仑三个专题的史学。第一个专题着重介绍了古朗治在其《古代城邦》和《古代法国制度史》中所表述的罗马学派观点。作者认为入侵的法兰克人没有带来新事物,入侵不是征服,而是罗马化的日耳曼人的和平定居。本章还评述了古朗治在史学方法论上的主要观点。第十二章为法国革命专章,所收史学家按其态度的态度,可分为基本肯定或否定,以及毁誉参半的三类。第八章介绍的聚贝尔《法国大革命时期史》即属于第二种类型。在本章中,古奇认为路易·勃朗《法国革命史》的价值,在于他第一个利用克罗克文献,为革命史研究开辟了一个丰富的资料来源,以及首先对旺代叛乱进行全面记述,成为后来研究者的先导。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提出,革命是旧制度的合乎逻辑的延续,只是加速了它的发展趋势。革命的动力来源于争取平等,但为平等而牺牲了自由。泰纳的《现

代法国的起源》以其全面否定大革命而知名。作者认为自1789年以来,法国人所想的和所作的“一半像疯子,一半像儿童”(第十二章),大革命乃是一次瓦解,生命财产的保障已随中央政权的倾覆而荡然无存了。古奇对索勒尔的《欧洲与法国革命》评价甚高,指出作者支持1789年原则,但谴责恐怖统治;把企图颠覆祖国的逃亡者与逃避迫害的流亡者加以区别;认为对外作战是为了保卫边境,防止旧制度复辟,但作得过分了。奥拉尔的巨著《法国革命政治史》以大革命的人民主权与平等的原则为主题,指出君主政体不是由共和派而是由自己的阴谋推翻的,恐怖政策乃是出于抵御外侮和保卫革命成果的需要,1793年的领导人拯救了法国。古奇认为他的最大贡献在于对革命文献的整理和编订。

在拿破仑研究方面,梯也尔的《执政府与帝国史》实为先驱。此书是形成拿破仑传说的主要来源之一,它给拿破仑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推动力(第十章)。路易·波拿巴的政变和普法战争使一些史学家对第二帝国的看法发生了巨大变化。梯也尔是其中之一;泰纳从对混乱和专制主义的仇恨出发,把拿破仑写得一无是处,说他生非其时,生非其地,实际上是一个文艺复兴时代的雇佣兵队长。另一方面,拿破仑的崇拜者乌松,从家庭和妇女等侧面研究这位伟人,认为皇帝代表了革命的崇高与祖国的神圣。法国民族只有在对皇帝的信仰中才能获得慰藉,达到心目中的复兴。旺达尔研究拿破仑家族,断言雾月政变不是摧毁自由,而是恢复秩序与繁荣;拿破仑不是窃权者,而是人民痛苦的平息者,民族团结的恢复者。

在论述英国史学的六章中,自由主义的辉格派史学所占的比

重最大。哈兰是此派的第一个权威代言人。他的《英国宪政史》是第一部具有国内国际意义的英国近代史,开创了一代辉格派史学。作者认为英国自古以来存在着-部明确的宪法,是斯图亚特王朝的君主破坏了宪法,但他谴责处死国王,他不满意共和国和护国政府,赞扬1688年革命。他的关于这一政变的评述成了辉格派政治理论的经典解释。继他而起的麦考莱早岁即以历史论文见称于时。古奇称其论文对17世纪18世纪的贡献不亚于莎士比亚戏剧对15世纪的贡献(第十四章,下同)。但也指出他知识面狭,具有偏见,文风粗放等缺点,说他“不过是一个通晓人情的,有文化的庸人”,他成功的秘诀在于文笔。称他的代表作《英国史》是对1688年革命及其发动者的一篇颂歌,也是“自古本以来英国语言中最伟大的著作”,这部著作使麦考莱成为使人们对历史发生兴趣的第一位英国作家。第十五章介绍了辉格派第三位大史学家格罗脱及其名著《希腊史》,认为此书以雅典民主政治及人民主权观念为核心,虽有偏重雅典,忽视其他城邦和忽视经济因素等缺点,仍不失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历史著作之一”。

辉格党人用历史来论证政见,而卡莱尔则用它来进行道德说教。他的《法国革命史》既表述了作者的伦理宗教观念,同时又是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但作者误解了革命的性质。古奇指出,卡莱尔在《英雄与英雄崇拜》中出现的不成熟的价值学说影响和损害了他的后期著作。他的门生夫鲁德在《英国史》中发展了英雄崇拜观点,把亨利八世也当作了民族英雄。

在英国,用严密的方法进行历史考订,自牛津学派的魁首斯塔布斯始。他是引进德国史学方法用力最勤的人。他的《英国宪政

史》是关于英国民族生活的第一部权威性记述,是探索英国宪法问题的第一次尝试。他的教学、研究工作以及参加《卷帙丛书》编纂的模范行动,使牛津形成了系统研究史学的中心。弗里曼则是与斯塔布斯在政治和学术上大相径庭的这一学派的另一大师。他以历史的统一性为其史学观点的核心,认为从古希腊直至近代,欧洲的历史没有中断,这是一大贡献。被古奇列入牛津学派的格林,异军突起,以其《英国人民简史》而驰誉史坛。他不是人民史的首倡者,而是第一个用具体的历史来阐明这一观点的人。此书打破王朝体系,以各时代的主要特征来划分历史时期,对民族生活的各个方面给予同样的注意。作者同情人民的疾苦与理想,始终站在被压迫者一边,此书的出版是“史学界划时代的大事”(第十七章)。

第十八章介绍加第纳、莱基、西莱与克莱顿,而以加第纳居首位。他第一次根据大量公私档案写成的一系列英国革命史巨著,“以同等深刻的见解,说明王党与议会各自的立场”,不同意辉格派史家对詹姆士一世的评价和对王朝专制、背叛国教的指摘,论证革命的爆发是由于个人统治已不能继续;对克伦威尔有赞扬也有谴责。他的著作被认为是19世纪后期英国史学界最坚实而持久的成就。对于莱基,古奇称许他的《十八世纪英国史》,认为其价值可与加第纳的著作媲美。西莱的代表作《英国的扩张》是第一部研究这一课题的专著,后来成了“英帝国主义的圣经”。

英国史学部分以阿克顿与麦特兰终篇,然而着力介绍的是前者。阿克顿是自由主义者,又是虔诚的天主教徒。他的自由思想与宗教信仰互相渗透,他宣扬宗教与科学的结合。阿克顿认为历史家的责任在于揭示自由的过程。他反对新教,也反对“教皇无谬论”

和“教皇极权主义”，肯定中世纪教会在同世俗权力斗争中使个人获得自由的作用。他谴责宗教改革导致了王权神授的理论与实践，歌颂法国大革命为人类解放所作的贡献，但认为其结果使议会专制取代了君主专制。阿克顿深受兰克史学方法的熏陶，强调研究工作的科学性、客观性；但又主张历史家不仅是事实的解释者，而且是伦理和公道的捍卫者，直到弥留之际他的关于历史的伦理观点才有所改变。

II

古奇出生于伦敦商人家庭，受教育于剑桥大学，毕业后曾赴柏林、巴黎留学。回国后，投身政治活动，但未放弃学术工作。1898年以《十七世纪英国民主思想》一文获提华尔征文奖。他是一位学者而兼政治活动家，在政治上属自由党的温和派。1906, 1913年两度被选为下院议员。自1911年开始主编有名的自由主义月刊《当代评论》，历四十九年之久。1922—1925年当选为英国历史协会主席，1933—1936年任英国和平理事会主席，1935年牛津大学赠予荣誉博士学位。古奇在史学领域有广泛的兴趣和多方面的才能。除史学史外，于英国近代外交史、思想史，以及德、法、俄等国近代史多所涉猎，撰有大量专著，其所主编的《剑桥英国外交政策史1783—1919》，《有关大战起源的英国文献1898—1914》，选材精审，内容详瞻，富有史料价值，名重一时；但在他所有著作中最受史坛推重的是《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这部著作。

古奇毕生生活于英国社会的上层，是19世纪英国自由主义培

育出来的学者。他在青年时代即服膺约翰·穆勒的哲学和政治历史学说。在柏林的进修,亲炙了兰克史学的流风余韵,对之深为向往。1896年结识了著名的自由思想家阿克顿,受其启发,他的上述获奖论文便是在后者的指点下写成的。阿克顿又是一位由德国史学训练成长的史学家,并且是在英国大力介绍这种史学的先驱者之一。他们的结交,加深了古奇对兰克史学的景慕。英国自由主义哲学与兰克史学方法,在尊重理性,不迷信权威,强调知识必须以经验为基础这些方面原有相通之处。古奇在长期的治学工作和政治生活中将二者融会贯通,形成了自己的史学体系:在政治历史观上,坚持温和的自由主义,在史学方法上,遵循兰克的道路。几十年来,不管英国和世界的形势如何风云变幻,他的史学体系没有重大变化。

典型的英国自由主义历史哲学的传统是,以个人和个人的自由意志为中心,强调个人自由(包括宗教信仰自由)和个人权利的至高无上地位;认为对于个人与社会国家的矛盾,可以调和、妥协,找出公私兼顾的中间道路。自由主义史学家坚信社会历史是一个不断的逐渐进步过程,个人、思想观念和偶然事件对历史发展能起作用,甚至是决定性作用。历史是可以认识和解释的,但社会历史运动没有什么类型或模式,没有什么必然性,对之不能作出概括和预定的结论。在历史研究和编纂中想象力和艺术表达具有重大意义,有的人甚至认为史学就是文学或艺术。兰克学派史学则以真实性、“客观性”为治史的最高准则,详尽地占有原始资料和对史料进行从外形到内容,从文字到作者的考核、鉴定,是编写历史的基本要求。他们认为研究和编写历史的目的是为了提供政治、道

德或宗教的教导,而是为了了解过去的真相。《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一书便是在这样的思想和方法指导下写成的。

在本书初版序言中,作者揭示的写作宗旨是:“总结并估计近百年历史研究与著作的成就,溯述科学方法的发展,衡量那些导致撰写著名著作的政治、宗教与种族影响,以及分析它们对当时生活和思想上所产生的效果”。我们知道,历史乃是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而作为意识形态的历史学又是“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①的。要总结史学成就和衡量其社会背景与社会效果,就不能脱离各个历史时期的社会经济条件、政治斗争形势和思想文化状况,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联与相互作用。古奇昧于此理,拒不承认历史现象中客观存在的、内在的联系和历史发展的规律性;认为历史哲学“是一项推测的工作”(第二十七章)“探索历史的目的及其规律(如果有这种规律的话)仍在继续中”(导论),现在“还不可能制定出足以满意地解释人类演化的规律”(第二十七章)。从全书的内容来看,他既反对唯心主义的历史决定论,也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而其矛头首先针对历史唯物主义。他把历史唯物主义称为“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体系”,称托洛茨基的《俄国革命史》为“一部马克思主义史学名著”。在《导论》中,一则曰:在俄国,“马克思主义的障碍已使公正无私的历史研究变为瘫痪”;再则曰:“在铁幕后,由于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历史研究继续处于瘫痪状态”。十分明显,他所非难的并非苏联的史学,而是历史唯物主义。本书只字不提马克思主义在促进西方史学发展上的影响,绝口不谈历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70页。

史唯物论使史学成为真正科学的伟大意义，充分反映了作者对马克思主义的无知和抵制的态度。

诚然，古奇也标榜“科学”的史学，历史的“科学研究”，但他使用的“科学”一词与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是有着本质区别的。书中赞扬尼布尔使史学变成了一门“庄严的独立科学”，兰克“创立了考证的科学”（第二章、第六章）；把由尼布尔、兰克所开创的近代德国史学这段历史称为“第二次文艺复兴时代”（第一章）。他往往以史料的价值与数量来衡量历史著作的高下，注意区分受过专门训练的职业史学家和业余史学家的界限等，可见古奇所宣扬的“科学”不过是兰克学派鼓吹的“科学方法”的翻版。古奇对于这位开宗创派的大师衷心仰慕，颂扬备致，甚至在兰克史学的神圣光环在其祖国已失去光辉的 50 年代，还在本书修订本中写道：“正是这位史学界中的歌德，使德国在欧洲赢得了学术上的至高无上地位。直到今天，他仍是我们所有人的师表”（第六章）。其崇敬之心竟是这样老而弥笃的。兰克史学奉史料可信、记事翔实为治史的最高准则，奉经验主义的方法为科学体系，实质上是把历史研究的手段和技术当作历史研究的目标，是当代西方史学家所通称的“对事实的崇拜”。遵循这种原则和方法来研究历史，就必然导致失去客观标准，不能认识历史本质，无法选择和表述事实。

步客观主义史学的后尘，古奇在比根版序言中要求历史学家，不要“忘记对读者道义上的责任”，并且大书特书道：“任何一个为自己的种族、自己的国家、自己的党派或教会大声辩护的人，是无缘进入历史女神之庙的”。然而，事实证明，任何标榜“客观”、“公正”的史学家既不是没有，也不可能完全隐瞒自己的政治立场和学

术观点的。对待社会主义这一新生事物，古奇就如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一样，也是心怀疑惧的。他竟把雅各宾专政目为“社会主义的开端”(第十八章)，还同意德意志帝国宪法“能抗拒掠夺性的社会主义”的说法(导论)。从全书的布局谋篇，选材立论上更无一不可看出作者的政治观点在起着支配作用。书中涉及史学家五百多人，除当代英国的 C. 希尔外，没有介绍其他知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受过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史学家，如法国的饶勒斯、英国的哈孟德夫妇和韦伯夫妇，以及经济史观创始人之一的罗哲斯等，记述极为简略，更未涉及他们的思想渊源。对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著名史学家也多是按照自己的政治历史观点作出选择的。如德国部分，摒除了《伟大德国农民战争史》的作者威美尔曼，讲英国史学，提到高德温的名字，而不介绍其民主性的史学观点；对另一民主治史学家——威廉·柯贝特则连名字也未曾提到。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称向俾斯麦屈膝投降，屠杀巴黎公社的刽子手梯也尔为“老资格的爱国者”(第十三章)；说斯塔布斯这个保守成性，偏见强烈的人能对历史“作出公正的判断”(第十八章)。书中记尼布尔的青年时代，《荷马导论》问世的经过，兰克门人对其先师的回忆，麦考莱的早慧，蒙森的一生经历等等，写来历历如数家珍，不厌其繁，作者的偏爱偏好，任情取舍是跃然纸上的。

作为胜利了的资产阶级思想体系，英国自由主义史学家一般地既肯定历史上的资产阶级革命，又宣扬尊重历史传统和合法权威；既歌颂启蒙运动的反专制主义精神，又鼓吹妥协改良的道路；既承认联合民众以争取民主和自由的必要，又畏惧下层人民的激烈行动，特别是以他们为主力进行的暴力革命。他们习惯于把英

国式的君主立宪政治的发展道路视为人类历史进步的楷模,^①用英国的政治历史经验为尺度来评价历史事件和历史著作,本书作者所持的便是这样的政治历史观点。古奇对历史变革时期人民大众的高昂激情和火热的行动,既缺乏理解也不能接受;对历史上的暴力行动和专政措施,不能明辨是非,划分正义与非正义的界限;因而在书中对英国革命者处死查理一世,威廉一世在格伦科的杀戮,雅各宾专政,拿破仑处决甘当公爵等事件,不加辨析地一概予以谴责。本书从浪漫主义的角度,把保守的夏丕布里安与富有民主精神的米什莱等量齐观。书中高度称誉米什莱在史学和文学的成就,但一再指出,在他的《法国革命史》中,“凡是好事,都是人民干的,凡是坏事,都是别人干的。至于暴民的凶残激情,和伴随大骚动而来的仇恨与嫉怨,他几乎不曾提到”。书中还断言他“缺乏历史家所应有的某些品质”(第九章)。这里大概指的是兰克的“客观、公正”和英国自由主义者的“宽容精神”吧。古奇称奥拉尔对君主制、封建主义和国家教会的憎恶,为“明显的偏见”;因他为恐怖政策辩解,而斥之为“好战的恐怖主义者”。书中特别推崇保守派索勒尔,认为他“既不象泰纳那样痛恨革命,也不象米什莱和路易·勃朗那样,对革命怀着奔放的激情”。他的革命史“是把大革命当作国际事件第一次完备的研究,也是以大革命作为法国历史一个插曲的最公正的论断之一”(第十二章)。对于格林的《英国人民简史》,古奇借他人之口写道:“他的同情看来不是寄予秩序方面,而是寄予动乱方面”;说他“在历史课本外衣掩盖下,在政治与宗教方

^① 古奇在书中多次借他国著名史学家,如尼布尔、泰纳等之口来赞美英国的政治制度和历史经验,参见第二、第十二章。

面散播了不少十分过激的见解”(第十七章)。西方史学研究者众所周知,法国王政复辟时期史学家梯叶里·基佐等人对史学理论所作的最大贡献是,他们把资产阶级和土地贵族争夺统治权的斗争,看作是理解中世纪以来的历史的钥匙,从而促进了史学思想的发展。古奇对这一史观不仅未予以全面系统的介绍,反而非难梯叶里,企图“以一个简单的公式来说明几百年的历史”“是错误的”(第九章)。梯叶里的“征服论”诚然有误,但古奇却看不见或不愿承认,这一派史家的阶级斗争学说具有开创性的意义,这不能不是作者害怕阶级斗争,特别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的反映。

在古奇轻视理论,反对历史概括的思想支配下,历史哲学和兰克学派以外的史学方法没有在本书占到应有的地位。书中虽也介绍了德罗伊曾、古朗治、泰纳、阿克顿等人的历史哲学和史学方法,但对其意义更为重要或至少不次于上述诸人的直接影响梯叶里等人以及实证主义史学的圣西门的社会历史观点,影响遍及欧美的黑格尔历史哲学,以至朗格诺瓦、伯恩海等人有名的史学方法著作,竟未给予介绍。还要特别指出的是,本书为法国浪漫主义史学辟了专章,而在近代西方史学中发生过重大影响的实证主义史学独付阙如。本书虽收入这一学派的代表人物多人,却未将他们和实证主义联系起来,更未能集中而系统地介绍这派史学的由来、共同特征和影响,这是本书不同于其它史学名著的独特之处。^①书中对泰纳和兰普雷希特着墨虽多,但未体现实证主义史学体系的本

^① 先于本书的傅埃特的名著《近代历史编纂史》有《在自然科学理论和社会学说影响下的历史编纂学》一章(第六章)介绍实证主义史学;后出的汤普逊《历史编纂史》有《实证主义史学家》一章(第五十五章)。

质;对英国的巴克尔,记事简略,一掠而过;对受实证主义观点方法影响较深,著名的社会经济史家罗哲斯、坎宁安和阿什利,毫未涉及他们研究工作的重大贡献及其意义。关于莱基,着重写的是他的18世纪英国以及爱尔兰史,勒南则是作为犹太史和教会史家来介绍的。在英国自由主义史家中,不少人对实证主义史学抱着强烈的偏见,^①古奇的这一冷漠和轻视的态度看来是踵伍前人,渊源有自的。

此外,本书不仅在叙事上如上文所述有取舍失当之处,在结构上亦有畸重畸轻的弊病,通检全书,德、法、英三国共占十七章,而包括史学素称昌盛的俄国和意大利在内的其余欧洲国家,则揉为一章,名之曰《诸小国》。在专题方面,古希腊罗马的研究既散见各章,又分别为专题,而地域远为辽阔,历史更为悠久的古代东方亦仅占一章,对于自19世纪末以来西方业已研究有素的中国和日本,几乎不着一字(仅开了一部书名)。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根源于指导思想和方法的误差,此书既未能保持真正客观公正的态度,也没有提供有关19世纪西方史学全面而准确的图景和规律性的知识。

III

本书对近代西方史学发展的总体认识,虽有偏颇,但由于作者

^① 英国自由主义史学名家自麦考莱至阿克顿对实证主义史学无不力肆诋毁。阿克顿甚至称整个实证主义哲学体系为“无教养或缺乏教养的创造”,说“巴克尔的荒谬与虚伪,不是他个人,而是他那个学派的特点”。参见J. M. Robertson: *Buckle and his Critics*, 1895, 第26—28页; Acton: *Historical Essays and Studies*, 1905, 第322—323, 342页。

尊重思想文化的延续性和继承性,恪守经验主义方法的传统,褒贬人物和评论事理,不从概念出发,而以事实为依归,加上他的深厚的史学修养和广博的知识,因而使得本书无论从思想观点、编纂方法和史料的考订与处理诸方面,较之前人都有所突破。书中不乏富有新意的深刻的思想,并提供了大量可资参考借鉴的史学史资料。其主要优点有三;

第一、比较重视史学流派与史学家的继承、嬗递关系及各自的特色,在一定程度上勾绘出了一些重要学派发展变化的轮廓。

在第一章中,作者指出18世纪史学结束了那个单纯汇编史料的时代,把史学的范围从记录事件扩大到论述文明,并企图把批判的标准和社会学的方法引入史学领域;同时也指出启蒙运动精神不利于历史主义的形成,这个时代所有的崇尚抽象与绝对的准则,满足于轻率的概括性论断,以及对史料缺乏批判能力等缺陷,从而揭示了19世纪史学所据以发展的基础,并预示了新的世纪所取得的成就的方面。以下几章介绍批判史学和民族主义史学在德国的兴起,二者之间的异同与联系,批判主义史学如何衍化为兰克史学,民族主义史学如何蜕变为沙文主义史学的过程,脉络贯通,层次分明。写兰克史学,突出其“客观、公正”的态度与方法。刻画他以新教徒之身,而用崇敬与宽容的笔法来评述天主教和教会的分裂;《普鲁士史》中毫未流露敌视奥地利的情绪,不触及西里西亚的主权问题;写《法国史》严词谴责圣巴托罗缪节的屠杀,而不非难亨利四世的政宗;谴责路易十四的外交政策,而不湮没其奖掖文艺的丰功。对“普鲁士学派”则侧重其运用历史为普鲁士王室效劳的特点。引聚贝尔的自我评价,说他“四分之四是政治家,七分之二是

教授”；称特赖齐克为“德意志最主观的史学家”，“最雄辩的教师，最热情的使徒，最强烈的党徒”，寥寥数语，勾勒出了这两位政客而兼史学家的基本形象，与“超然物外”的兰克形成鲜明的对照。英国史学部分，流派众多，头绪纷繁，政治上有民主与保守的分野，史学方法论上有强调考证与强调艺术性的不同，乃至个人心理气质、研究方向上千差万别，但从史学体系来看，除自成一家的卡莱尔及其门人弗鲁德外，大多属于自由主义史学的范畴，古奇写来生动具体，既有共性又有个性，无一般化之弊，给人以较为深刻的印象。

对一些著名史学家的观点、方法的形成与演变，本书也力图探原溯流，加以分析。比如在介绍聚贝尔时，就把他的史学分作两个阶段（分见两章）。早期的聚贝尔谨遵师教，但已显示出与兰克异趣的政治倾向和学术见解，1848年欧洲革命促成了他与师门决裂。对于特赖齐克，古奇指出，在1870年以前他鼓吹以普鲁士为中心，尚未越出民族主义史学范围。德国统一后，日益倒退，捍卫绝对主义，宣扬弱肉强食的法则，仇视议会政治、和平主义与社会主义，煽动大日耳曼主义和对外扩张；与那位铁血宰相，声应气求，博得了“讲坛上的俾斯麦”的称号。梯也尔对待拿破仑的态度也是几经变化的。在其早期著作中歌颂他拯救了法国。经历了路易·波拿巴政变之后，梯也尔把对侄儿的仇恨迁怒于其伯父，在他笔下，拿破仑成了暴君；但是，当写到联军入侵法国时，作者再次改变态度，称自厄尔巴岛逃出来的拿破仑是和平爱好者和立宪主义者。关于卡莱尔的英雄崇拜思想，本书指出这位哲人是由早年写卑微的芸芸众生逐渐转向专为英雄伟人树碑立传的。古奇对他所师事的阿克顿的思想变化，更是烂熟于心，写来线索分明。自1868年

发表有关巴托罗缪节惨案的论文开始，阿克顿由是而从旧教的辩护人转变为史学家。自1870年梵蒂冈会议和1874年关于宗教问题的论战后，“信条主义”便从他著作中消失，自由主义思想有了进一步增长。本书对以上学派和史家的记述与分析有理有据，要言不繁，语多精当，对研究西方史学的人，富有启发意义。

作者对西欧诸大国史学源流、演变也多成竹在胸，注意到了各国史学思想之间的纵横联系，对研究欧洲中世纪的罗马派和日耳曼派的一些代表人物，常常提及他们之间的交互影响和各自的特色，对于全面考镜史学源流不乏参考价值。

第二、继承和维护了上升时期英国自由主义史学的一些积极的思想因素，能对某些错误或反动的观点，作出比较符合实际的评断或批判。

站在自由资产阶级立场，古奇旗帜鲜明地拥护历史上的资产阶级革命，歌颂它们的成就和历史意义，捍卫资产阶级反封建的胜利成果。在分析被马克思称为“（旧制度的）德国理论”时，^①指出这一学派的优点在于重视历史的连续性和继承性，其危害则在于阻碍现实的创造力。这种观点只要前进一步，“就达到了拥护积弊的境界，在正统主义外衣下掩盖了古老的僭窃行为”，他称之为“顽固的保守主义”（第四章）。他的评议虽没有和德国封建势力的根深蒂固与资产阶级的软弱性联系起来，但寥寥数语，仍然击中了要害。对法国大革命的理解和评价，历来众说纷纭，因人而异。古奇在肯定卡莱尔《法国革命史》的成就时指出，此书的最大缺陷是误解了革命的性质，把它看成是纯粹破坏性的，“不知道法国革命乃

^① 马克思：《法的历史学派的哲学宣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101页。

是 19 世纪的直接根据,在它的恐怖背后,还滋育着一种更宽广的生活种子,它作出过带有永久性的、建设性的工作,它汲取过旧制度里面的不少观念与倾向”(第十六章)。这段含义深刻的文字基本上道出了法国大革命继往开来的伟大历史意义。对聚贝尔和泰纳诬蔑诽谤大革命的著作,古奇作了义正词严的谴责。他说聚贝尔“没有认识到一个民族的激昂情感,没有看到他们任务的极端艰难,没有看到宫廷无休止的阴谋”;他的书出于民族的和王朝的偏见,“不仅贬低这幕戏的演员,同样也贬低了法国革命本身”(第八章)。对于泰纳的《现代法国的未来》,古奇在分析它在方法论上的错误之后引用哈诺托的话说:“这本书以它笼罩在绝望的气氛中的篇幅,延长了和重新发出了被征服者的哀音”(第十二章),点出了这种观点所反映的阶级实质。

古奇倾向于把 1789 年大革命的本质和革命中的出现的恐怖现象加以区别的观点。他反对雅各宾派的恐怖统治,但不认为这种情况根源于某些领导人的变态心理或某种思想影响。泰纳谴责雅各宾党人闭眼不见周围事实的罪行。古奇却指出泰纳本人“闭眼不见那些指导他们行动的最重要的力量”,说他忘却了一个历史家在作出批判时“必须了解这些人所面临的问题的性质”(第十二章,下同),并明确指出这些革命领导人被人逼得发狂,“不是由于卢梭,而是由于害怕失掉革命的成果”,一语破的,并显示了他与那些恶意攻击恐怖政策者的观点上的分歧。

卡莱尔社会历史思想体系的核心是“批评资本主义,憎恨民主,号召把现代的经济活动加以封建主义化”。^① 憎恨资产阶级民

^① 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笔记》,《列宁全集》第 39 卷,第 592 页。

主可以说是他的英雄崇拜和实力崇拜的出发点。古奇对这一思想体系,一针见血的指出,他“虽能以无比清晰的目光详察个别人物,却竟闭眼看不见群众的根本存在”。说他的全部哲学是“普通凡人只能交由他们的主子管教、惩治”(第十六章)。古奇对他一向尊敬的兰克也不免微词,认为这位大师“过多地从会议窗口来瞭望事件,而忽略了群众”(第六章)。这些评议并不能说明作者对人民群众和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已具备了科学的认识,而是反映了他对英雄史观和极权主义的反感,对资产阶级民主与自由的坚定的信念,而这种观点较之超人哲学和法西斯主义是高下有别的。

上节分析了古奇史学的经验主义方法的缺点。但也应看到,尊重事实,言必有据,是史学工作的基本要求。这种方法注意到了历史现象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在克服从先验的原则出发,对历史进行抽象推理的弊病上,在纠正历史研究的简单化、模式化的倾向上,以及在解决具体问题和积累有用的知识方面,曾经起过有益的作用。古奇从经验主义和客观主义的原则出发评论普鲁士学派,作出了这样的总结:“如果历史主要目的是鼓励一个民族采取行动,那么,这一派史学家都应归入最伟大的史学家的行列。如果历史基本目的是揭示真实情况和解释人类的活动,那么,就没有什么理由把他们算作第一流的史学家”(第八章)。对于泰纳,古奇称他“特别喜欢公式和定义,为了公式和定义,他常“牺牲真实性”(第十二章)。说他对法国大革命的判断,是在研究有关资料之前即已形成,然后才搜集资料,因而往往不惜割裂和歪曲文献,断章取义来论证自己的观点。古奇批评卡莱尔“所关心的主要是如何使他的主角生动起来”(第十六章),为此而不惜任意篡改原文,并把一些古

人的演说词加以现代化。还批评夫鲁德史学的特色是“持论不公”，“个人好恶十分强烈”(第十六章)。对自由主义史学的前辈大师麦考莱，作者也不稍宽假，说他的历史论文“主要目的在于传播某种主张”(第十四章)，指的是辉格党的政见。应当说，这样一些分析批判，大体上抓着了上述史学家在方法论上的主要缺失，对于今天的史学工作者也是可引以为戒的。

古奇此书问世迄今半个多世纪了。自本世纪初，特别是二次大战后以来，西方的自由主义史学传统频频受到冲击，倒退、反动的思潮甚嚣尘上。有的人力图把史学引入神学；有人主张历史是史学家心灵活动的记录，不能得到证实和进行解释；有人把历史归结为英雄、杰出的政治家、实业家活动的记录，散播唯意志论；有人认为社会历史运动并非向前进步的过程，而是无目的的起伏或重复，对人类前途悲观，绝望。还有人把资产阶级革命的概念，提出批判，否认法国大革命的反封建性，甚至把它说成是一个神话。^①面对当前这种混乱状态，对古奇史学观点中的积极因素，予以历史地肯定想来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精神的。

第三、提供了较为丰富而信实的事实材料和思想材料。

古奇博闻强记，治学勤奋，穷数十年之力，积累了丰富的史学史资料。本书征引和采择了有关史学名家的专著、论文、札记、日记、书牍、自传、回忆录、全集、选集、文集；同代人或后人所写的传记、回忆录、专著，权威性的论文，考古发掘报告等等，范围至为广

^① 1954年5月伦敦大学法国史教授科班(A. Cobban)发表了题为《法国大革命的神话》的讲演。1978年他出版了《法国大革命》一书，此书的末章的标题是《大革命——历史和神话》。在法、美等国亦不乏持这种观点的学者。

泛，其中包括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有的还是今已绝版的稀有文献。古奇著史，多采寓言于史的手法，记述多而评议少，征引的史实大多出于史家的原著和时人的载述，通过这样一些方式，保存和介绍了不经见的原始资料。

此书自初版至五十年代的修订，阅世四十余载。作者在修订中增补了在这段时间内，随着考古工作的进展，新档案文献的公布和发现，相关学科的发达，历史研究范围的扩大和深入所获得的新成果和新资料。这种长时期锲而不舍，孜孜以求，注意知识更新的努力，使本书经受了时间的检验。

本书在资料方面的另一优点在于它的注释。各章各节的附注实际上是本章节所涉及的学派和史家的参考文献指南。注释中所介绍的都是经过抉择，有较高学术价值的史料与史著，少而精审。古奇对他推崇的史学大家，所开目录，尤为详瞻。如在兰克一章即列出了他的兄弟所撰写关于兰克青年时代的回忆录；在阿克顿一节提到了他的未刊文稿。还应当指出的是作者在附注中常常介绍文献中最有价值的部分或最佳版本，有时也就学术界有争议的问题，发抒己见，有助于初学者扩大知识领域和掌握进行研究的线索。

总之，本书在介绍 19 世纪西方史学思潮与流派的衍变，史学方法的改进，重大研究成果，史料的搜集和整理，历史知识的积累与普及诸多方面，提供了不少有用的材料。只要我们遵循历史唯物主义的教导，用批判吸收的态度进行阅读，无疑是可以从中获得较大的启发和助益的。

谭英华

目 录

灯塔版序言	3
第二版序言	5
第一版序言	6
导 论 近时的历史研究	8
1952年以来的历史研究	59
第 一 章 从文艺复兴到法国革命	67
第 二 章 尼布尔	92
第 三 章 沃尔夫、博克和奥特弗里德·缪勒	107
第 四 章 艾希霍恩、萨维尼和雅各布·格林	129
第 五 章 德意志史料集成	159
第 六 章 兰克	175
第 七 章 兰克的批评者和门生	216
第 八 章 普鲁士学派	251
第 九 章 法国浪漫主义学派	294
第 十 章 法国政治学派——基佐、米涅、梯也尔	332
第十一章 法国的中世纪时代和旧制度	360
第十二章 法国大革命	388
第十三章 拿破仑	428
第十四章 哈兰和麦考莱	467
第十五章 提尔华尔、格罗脱和亚诺尔	504

第十六章	卡莱尔与弗劳德·····	524
第十七章	牛津学派·····	549
第十八章	加第纳、莱基、西莱与克莱顿·····	575
第十九章	阿克顿和梅特兰·····	602
第二十章	美国·····	638
第二十一章	诸小国·····	671
第二十二章	古代东方·····	700
第二十三章	希腊和拜占庭·····	735
第二十四章	蒙森和罗马史研究·····	764
第二十五章	犹太人和基督教会·····	792
第二十六章	天主教史学·····	829
第二十七章	文明史·····	859
索 引·····		887
编 后 记·····		896